



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建窑建盏文化展上,工作人员展示宋式斗茶。

赵佶的《文会图》描绘了侍者备茶、文士品茶的场景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在一个信息爆炸、注意力有限的时代,我们似乎倾向于给人“贴标签”。实际上,人的一生充满偶然性,那些小时候立志当科学家的人,后来可能从事与科学完全不搭边的工作;种地的农民、矿场的爆破工,最后可能成了作家。循着这条复杂多变的曲线,你会发现: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,也曾涉足其他领域,并有书籍传世。我们姑且把那些与他们在公众认知里的主要职业不相关的著述,称为“业外书”“破壁书”,去书中探一探他们的另一面人生。

名人写书也跨界?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安明

《大观茶论》 文艺青年赵佶的茶说

提到宋徽宗赵佶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“靖康之耻”。他在皇帝这个岗位上,声誉较差,但在绘画、书法、茶艺等方面,却展露出过人的天赋,以致史书评价他“诸事皆能,独不能为君耳!”

中国茶文化“兴于唐而盛于宋”,进入北宋后,缙绅之士、韦布之流“相从茗饮”。赵佶不仅喜欢喝茶,还懂鉴茶,他写的《大观茶论》对中国茶文化影响深远。

据余悦、虞文霞等学者考证,《大观茶论》写成于大观元年至大观二年间,即公元1107年至1108年,赵佶二十五六岁的时候。这本书分为20目,从茶叶的种植、采制、烘点、品鉴等方面,介绍了宋代的茶工艺和茶文化。他写茶书,不满足于“搬运”他人观点,有很多自己的观察和体悟。《延福宫曲宴记》记载,宣和二年(1120年),赵佶曾留下大臣赐宴,当众表演分茶技艺。

赵佶认为,茶是灵秀之物,饮茶能令人清和宁静。他在《大观茶论》中描述了一个“青白”的茶世界:点茶之色,以纯白为上,青白为次,灰白次之,黄白又次之;茶盏以青黑为贵,因为青色或黑色,能更好地衬托茶汤的清和白。

“七汤点茶法”是《大观茶论》中最精彩的部分,也是最能体现宋茶之“精”的部分。看似简单的冲茶(冲泡搅拌茶末),需要先后用沸水冲七次,每次冲茶的水量、力度、角度,以及用茶筴击拂的方式、快慢都不一样。第二次后,茶的色泽渐渐舒展开,茶面上泛起珠玑似的汤花;第三次后,茶面上凝结粟纹、蟹眼纹;第七次后,茶面上的细乳如云雾汹涌,形成“咬盏”的效果……据说,赵佶喝茶,不喝茶汤,而是品尝茶面上的白色浮沫,从茶盏中分盛浮沫的过程,被他称为“分云入碗”。或许在他看来,好的茶如云似雪,是人和自然沟通的纽带。

《大观茶论》中关于采茶、蒸压、制茶、点茶乃至茶具使用的细致描述,充分体现了宋人对茶之风雅的崇尚。我们常说文人画,赵佶的茶说,颇有文人

茶的韵味。如今,位于福建建瓯市的宋茶北苑·建州宋式点茶非遗传习所,复原了《大观茶论》记载的点茶工序,不少游客专门到此学习宋式点茶技艺。
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 文物研究者沈从文的“衣缘”

知道小说《边城》的人,大抵不会不知道沈从文。他笔下的湘西宁静秀美,令人神往。这位创作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作家,后半生转入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注意的领域——文化史与文物研究,尤其是古代服饰研究。他前后花了十多年撰写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,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服饰的通史。

1949年8月,曾在多所高校任教的沈从文转入历史博物馆(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)工作,被安排在历史陈列组,主要负责清点登记库房文

物和展陈事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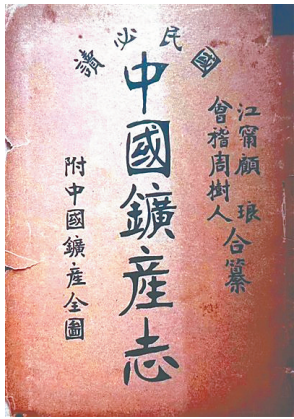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曾撰文回忆,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后,当过讲解员。有一次,常书鸿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,沈从文自告奋勇,去现场给观众讲解,每天都去。

1960年前后,搞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服饰研究方面。1963年冬,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文化部相关负责人时说,陪外宾看戏,发现国内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,和历史不符;还说出国访问,见到很多国家都有服装博物馆,有服装史,中国还没有;问有没有人在研究这项内容,能否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,当作礼物送给外宾。文化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周总理,沈从文正在研究中国服装史。就这样,编书的任务落到了沈从文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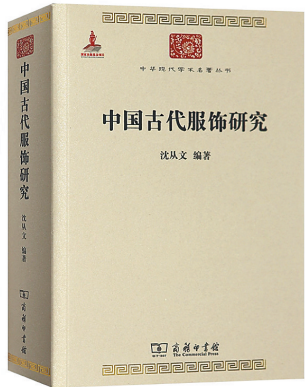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带领团队搜集图片、撰写文字。直到1978年,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,书稿才最终修订完成。1981年,这本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,书名定为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
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共有25万字、900余幅插图。沈从文通过综合分析传世文献、出土实物等,系统阐述我国古代服饰的形制、流变及审美趣味。他认为,服饰是风骨、气韵、审美追求的外化,具有“载道”“章身”“彰德”的功能。

即便是服饰类专著,这本书也明显带有沈从文的文风:行文自然平实,时出趣语,一解研究类著作的玄奥。“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”,是汪曾祺对此书的评价。



《中国矿产志》。


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

《中国矿产志》 “地质生”鲁迅的报国志

鲁迅一生创作了众多小说、杂文,但他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却与文学无关,而是一部地质学专著——《中国矿产志》。他曾在演讲时说:“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,叫我讲掘煤,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。”

清末,列强多次侵略中国,民族危机深重。1898年,18岁的鲁迅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,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。半年后,他想到国家

的当务之急是开发矿业,而不是建设海军,便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。

矿务铁路学堂由洋务派主导开办,课程以开矿为主、铁路为辅。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班学生(1898年10月—1902年1月,共24人)。在校期间,鲁迅学习刻苦,记了很多听课笔记,甚至花时间去描摹书中的地质构造图。毕业前夕,他曾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并下矿洞挖煤,共13天。最终,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,成为班上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,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。

“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,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,而诸国犹群相要曰:采掘权!采掘权!”鲁迅在日本时,看到列强侵占我国矿产的事时有发生,忧心忡忡,决定与同窗顾琅合作,编著《中国矿产志》,让国人了解中国矿产的分布,呼吁同胞抵御列强对我国矿产的觊觎和掠夺。

为了写这部专著,他“特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,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,撮精删芜,汇为是编”;发现一直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《中国矿产全图》,他“急转借摹绘”,收录书中。

1906年,《中国矿产志》出版,不到一年印行三版,颇为畅销。清政府农工商部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,通飭各省矿务界、商务界购阅;学部批准其为“国民必读书”和“中学堂参考书”。时任上海复旦学校校长的马相伯说此书“用心至深,积虑至切……深有裨于祖国”。

《中国矿产志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地质学专著,对当时中国18行省的矿产分布有详细记述,其中不少矿物产地至今仍是重要的矿业基地。鲁迅写书的主要目的,是希望引起国人的警惕,“不致家藏货宝,为他人所攘夺”。

从学矿务到翻译科幻小说,再到学医和“弃医从文”,鲁迅没有局限于一己的人生设计,而是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,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,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担当。■